

# 1367 年的记忆：吴城之围与元末明初江南诗史的挫折

余来明

**内容提要** 易代之际文学的演进往往与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紧密相关。作为元末明初文学中心的吴中，在元明鼎革的历史变局中经历由盛而衰的转变，而造成转变的关键在于 1366 至 1367 年间长达十月的吴城之围。这一发生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事件，使元末以来兴盛发展的江南诗歌遭遇挫折，以吴中为中心的江南诗人命运因之发生转折，诗歌唱和群体最终走向瓦解，张羽的“围中忆友”就是在特殊情境下对元末江南诗坛盛景的追忆和悼念。入明以后，作为吴中诗人前朝记忆的最佳承载，吴城之围的经历在改变他们诗歌情感表达的同时，也使他们更深切地体悟到人生的无常，而高启、杨基等吴中诗人非正常死亡的结局，又为这种无常人生做了最好注脚。历史事件、人物命运和诗史演进三者之间的交错关系，在元明易代之际得到真切反映。

**关键词** 1367 年；吴城之围；吴中诗人；情感记忆；江南诗史

在中国历史上，王朝更替常伴随大规模的军事冲突，又往往有数股军事力量相互角逐，由此战争波及的区域也常十分广阔。元末从至正八年（1348）前后相继在黄河以南各地爆发的割据战争，将南方大地的士人带入了硝烟弥漫的苦难地狱，死于“贼乱”者不计其数，所谓“世故一变更，十室九颠覆”<sup>[1]</sup>，即是当时的实情写照。而在战火遍布的江南大地，有一处地方却显得格外平静，这就是张士诚占领之下的苏州。从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攻陷苏州（时称平江），到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城破，长达 13 年间，苏州城始终处于张士诚控制之下。对避居吴城的士人来说，张士诚治下的苏州是聚集唱和的理想去处，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“北郭诗社”就诞生于此。元末吴中诗人唱和风气的兴盛，正是该时期江南诗坛繁荣景象的写照。

然而一切美好在被围困之后荡然无存。从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十一月苏州城被围，到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九月城破，在长达十个月的围城

之困中，身陷城中的文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体验？城外士人又是抱着怎样的心态看待这种非常规的围城生活？在一个与外隔绝的空间，面对时刻失去生命的危险，诗人会想到什么？做些什么？写些什么？1366 至 1367 年的苏州，不过是元末明初江南诗史的一个缩影。对彼时身处江南的诗人们来说，张士诚治下吴城的平静生活，只是他们短暂逃离乱离时代自我构筑的幻境，在被明兵围困之后走向破灭，随之陷入无尽黑暗的深渊：虽然像高启、杨基、徐贲、张羽等人，都侥幸躲过了围城之后的身死之厄，却最终未能逃脱非正常死亡的命运。由此形成本文所说的“江南诗史的挫折”，既包含入明后以吴中诗人为核心的江南诗人命运的转折，同时也有他们不断追念“吴城记忆”情感抒写的变化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诗歌是进入历史的最佳途径。阅读元末明初诗人写于 1367 年吴城被围期间以及之后追忆过往经历的作品，透见的正是这一时期江南诗史记录历史、抒写情感的某些侧面，也是该时期江南诗歌由盛入衰的见证。

## 一 十月围城：易代之变与江南诗人命运的转折

张士诚占据苏州（元称平江），是在至正十六年（1356）。当年二月，张士诚之弟张士德率军攻陷平江路，改平江路为隆平府<sup>[2]</sup>。此时距离张士诚至正十三年（1353）起兵泰州已过去三年。三年间，张士诚的追随者已经从最初的18人，发展到十数万众；从最初的到处流窜、兄弟被杀，到占据泰州、兴化、高邮、扬州、常熟、通州等江浙一带的广阔地域；其名号也由最初的张九四，而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周的诚王。在此过程中，张士诚多次经历元朝大军的征讨，却每每都能因势取胜；元朝政府也曾多次试图招安张士诚，却被他当作诱害元将的计谋，李齐、盛昭、孙搦等因此被杀。

张士诚占据平江之后，开始建立起日常管理的行政机构，设立弘文馆、枢密院以及太守、通守、县尹、府丞、从事等一系列的官署和职位。对于这一系列的改变，吴地士人大多以肯定的态度予以嘉赏。如杨基《送张府判诗序》称其：“渡江来吴，念吴民多艰，牧字者多非其才，悉选而更张之。”<sup>[3]</sup>自在苏州站稳脚跟后，张士诚开始向周围扩张，先后占据湖州、松江、常州、湖州、嘉兴等地。然而此时张士诚却迎来了另一割据势力的强力挑战，这就是当时还是自称吴国公的朱元璋。在徐达、常遇春等人的辅佐下，朱元璋在与张士诚的交战中屡获胜绩，常州、长兴、泰兴、江阴、常熟、无锡等地均被朱元璋所夺。正是在这种窘迫的境地下，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八月，张士诚选择向元朝政府投降，遂被授予太尉。尽管被认为并非真心归降，然而从名义上来说，此时的张士诚已是元臣，因而对士人来说在情感上比较容易接受。陈基将这种情感上的认同归功于张士诚的个人魅力。他在《送周信夫序》中说：“今太尉以武济时，以文经国，不爱玉帛舆马，招来贤俊，四方奇拔之士，闻风而至者相望也。”<sup>[4]</sup>这样的赞颂，当然可能只是一面之词。陈基曾辅佐张士诚之弟张士信镇守杭州，以美辞表彰张士诚也就在情理当中。然而从张氏政权对吴地士人的吸引力来看，却也并非全是

谀词。

当然，也不是所有的东南士人都愿意为张士诚所用，其中最著名的自然要属元末名盛一时的铁崖老人杨维桢。他元末时避居松江，曾受张士诚征召至苏州，然而却不愿为官，赋诗而归。都穆《南濠诗话》记载说：“张士诚据有吴中，东南名士多往依之。不可致者，惟杨廉夫一人，士诚无以为计。一日，闻其来吴，使人要于路，廉夫不得已，乃至宾贤馆中。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，士诚闻廉夫至，甚说，即命饮以御酒。酒未半，廉夫作诗云：‘江南岁岁烽烟起，海上年年御酒来。如此烽烟如此酒，老夫怀抱几时开？’士诚得诗，知廉夫不可屈，不强留也。”<sup>[5]</sup>是否实有其事虽难以确证，但杨维桢作为当时江南最有名的文人，必然曾受到来自不同割据势力的邀请，而他最终并未接受任何一方的征聘。此外，张昱也曾作《辞答张太尉见招》诗，表达不愿出仕之意：

中年顿觉壮心去，涉世颇知前事非。若使范增能少用，肯教刘表失相依。风云天上浑无定，麟凤人间不受羁。残梦已随舟楫远，五湖春水一鸥飞。<sup>[6]</sup>

张昱元末时曾辅佐杨完者镇守浙江，官至左右司员外郎、行枢密院判官，后弃官不仕。他之所以不接受张士诚的招纳，大约是因为自己曾在杨完者府中任职，而杨完者至正十八年（1358）的死又与张士诚有直接关系。讽刺的是，当初张士诚能顺利投元，却是杨完者极力撮合的结果。因此他在诗中才会以范增、刘表的典故来加以隐喻。诗最后说“残梦已随舟楫远”，则颇有一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意味。张昱曾写过两首怀念昔日从戎岁月的诗，都与杨完者有关。一首题为《杨忠愍公墓上作》：

梦觉邯郸万有空，邦人犹自说英雄。道家论将忌三世，臣子报君惟一忠。浅土何堪封马鬣，迷魂犹自恨秋风。死绥固是将军事，国史旗常画隼功。<sup>[7]</sup>

另一首题作《过杨忠愍公军府留题》：

总是田家门下客，谁于军府若为情。林花满树莺都散，雨水平池草自生。街上相逢惊故吏，马前迎拜泣残兵。能言楼上题诗处，犹有将军旧姓名。<sup>[8]</sup>

正是由于存有“臣子报君惟一忠”之心，张昱即使入明以后受到征聘，也没有再仕为官的想法，最后被赐放还。

在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名义上归附元朝政府之后，张士诚当年冬天开始在虎丘大规模修筑城墙。或许正是因为至正十七年（1357）的这一次重修改造，使得苏州城变得坚固易守，也才有后来被徐达率兵围困十月的遭遇。根据《虎丘志》记载，“是冬，张氏筑城虎丘，因高据险，役凡月余而竣，周南、邾经辈有诗纪之。”<sup>[9]</sup>邾经所作《春陪吕志学曾彦鲁刘仲原同登虎丘赋呈居中长老》诗云：

虎丘山前新筑城，虎丘寺里断人行。梵僧自识灰千劫，蜀魄时飘泪一声。渐少松杉围宰堵，无多桃李过清明。向来游事夸全盛，曾对春风咏太平。<sup>[10]</sup>

据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记载，明人王宾曾编辑《虎丘诗集》一卷，收录邾经、吕敏、曾朴、释宁居中、周南老等人记录此次修城的诗作<sup>[11]</sup>。在变幻莫测的历史烟云中，邾经等人大概也不会想到，眼前这座楼台耸立的新城，会在十余年后的战火中轰然倒塌。就连邾经自己，或许也未曾料到，在十多年后他垂垂将老之时，还会被发配到遥远的云南边地，经受乡思和瘴气的双重折磨。

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，在消灭了自己的另一大竞争对手陈友谅之后，朱元璋下令徐达、常遇春挥师淮东，开始向张士诚统治的核心区域逼近。于是可以看到，从至正二十五年（1365）十月徐达、常遇春受命向张士诚的辖地发动进攻，到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十一月实现对苏州城的围困，张士诚的势力范围，从最初“南至绍兴，与方国珍接壤；北至通、泰、高邮、淮安、徐、宿、濠、泗；又北至于济宁，与山东相距”，“带甲数十万”，到最后只留下孤零零的一座苏州城，仅过去一年多时间，溃败的速度不可谓不快。在明兵向苏州城步步紧逼的过程中，张士诚也曾试图以“围魏救赵”的战术来摆脱日益严峻的局势。然而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。从当年三月到十一月，徐达率领的大明军队先后攻克高邮、淮安、徐州、宿州、湖州、吴江、杭州、绍兴，苏州便成了一座孤城。当时参常遇春军务的汪广洋，面对千年古城苏州，写下了一首

《姑苏台有感》：

何事夫差日渐淫，都将兴废付登临。霸图反手归尝胆，醉魄流涎属捧心。台土尚存芳草合，鹿麋空卧古苔深。唯应胥口波涛急，百折东流感至今。<sup>[12]</sup>

虽然很难将张士诚、朱元璋与古之夫差、勾践相对比，然而历经千年废兴的姑苏台，却再次见证了历史成亡的变迁。困守苏州城内的张士诚，最终被证明只是困兽犹斗。面对已不可为的战局却不懂得顺势而行，或许正是激怒朱元璋以致其对吴城充满敌意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历经十个月的攻守战，吴城在1367年秋被徐达大军突破，张士诚被俘，押送至南京，自缢而亡。同时被一同押送到南京的，还有“其官属平章李行素、徐义，右丞饶介，参政马玉麟、谢节、王原恭、董绶、陈恭，同佥高礼，参军陈基，右丞潘元绍等所部将士，杭、湖、嘉兴、松江等府官吏、家属及外郡流寓之人，凡二十万余，并元宗室神保大王、黑汉等”<sup>[13]</sup>。如此大规模的俘虏押解，其场面之浩大令人无法想象。而如此众多的俘虏，除了少数被处以极刑之外，大多被流放到临濠、辽东、云南等边地、苦地，其中不乏像杨基、徐贲等当时知名的文士。数年后，蒲山名士魏观出任苏州知府，在张士诚旧宫殿的遗址上重修府衙，吴城往事重被提起，结果被朱元璋处以极刑，而元末因隐居不仕得以免遭俘虏、流放命运的高启，以及曾以“文妖”抨击杨维桢的王彝，也在这一事件中同遭厄运。当年吴城北郭唱和的一众士人，除了和尚身份的道衍（姚广孝），在明初几乎都没能逃脱悲惨下场。

## 二 围中忆往：以诗存人与江南诗坛侧影

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六月一日，身处吴城围困中的张羽，应友人吕敏所请，写下行书长卷《怀友诗》23首并序和跋。该长卷经过后人重装得以保存，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<sup>[14]</sup>。文献中记载张羽《怀友诗》较早的是李日华的《六研斋笔记》，他称赞张羽的书法“纤婉有异趣，仿佛谢庄月赋，亦

墨宝中结璘火齐也”，并录诗序及23人诗，次序与今存图卷略有不同，末署“至正丁未六月一日浔阳张羽”，而不及跋<sup>[15]</sup>。张丑《真迹目录》亦载：“张来仪《怀友诗图卷》：诗凡廿三首，盖为吕志学写者。诗前有短图，文寿承为之，题署跋尾又有朱子詹印记。”<sup>[16]</sup>吕志学即吕敏，号荅轩高士，元末时与张羽、高启等人寓居吴城北郭，相互以诗唱和。

张羽的23首怀友诗每诗怀友一人，其中除了倪瓒、牛谅、唐肃等少数几人在当时较为知名，大多在元末明初时行迹都不甚显。23人虽然只是他元末交往的部分文人，却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动乱时代弱势文人的群体图像。又因这些文人元末时均身处江南，因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江南诗坛的基本面貌。23人分别为：牛谅、冯允实、王钦、韩相、莘野、周复、陈恂、陈尧咨、莫世安、方彝、牟鲁、叶广居、唐肃、安处善、朱武、宇文材、董在、倪瓒、释怀渭、沈梦麟、胡铉、潘牧、李讷。通常来说，人在生命即将消逝的时候，对往事的追忆最为热切，仿佛像要留住时光一样。对身处吴城围中的张羽来说，追忆和怀念曾经交往的诗友，就是抱着这样一种感情。那时的他，或许已经极度压抑，而借助对诗友的追忆，对曾经美好交游时光的怀念，这种压抑的情感获得了释放的空间，过往的人生也开始变得鲜活，让人不禁再次沉浸其中。换个角度看，身处围城当中的诗人也是在检点生平，以“写友”记录一段个人“诗史”。

张羽所作《怀友诗》，相交友人中有四位曾为之题辞，即当时同处围城的高启、徐贲、杨基、王行，而今可见的是徐贲、王行二人的题诗和跋。徐贲《题张来仪怀友诗后》诗二首作于入明以后，诗云：

乱前草草别相知，乱后风光不尽思。惟我与君今日见，不堪来读卷中诗。

重读浔阳怀友诗，众中多是我相知。秋风落木乡园外，可有人能为我思。<sup>[17]</sup>

王行《题张来仪怀友诗》跋文同样也作于入明以后。时空流转，再读其诗，王行有感而发：

张君处围城中，朝夕自忧之不暇，乃能推己之忧，以忧朋友之忧，形诸赋咏，其于友义

何如也？且君学茂德修，所著必为世重。是诗既传，则于朋友之道，所补不深已乎！<sup>[18]</sup>

从高启、徐贲、杨基、张羽、王行等人入明后所作的诗文中，经常能读到昔日友人难聚的感慨。张羽身处围城中作《怀友诗》，虽然诗中友人已经散处各地，但相互间曾有过难忘的欢聚时光，因而可以说是一段关于元末诗友间燕聚唱酬的见证。与此形成对照，入明以后，人事沧桑变幻，再无昔日友朋相聚的欢愉，所谓“不堪来读卷中诗”“可有人能为我思”，含有不尽的悲伤落寞之意。诗史的转折，也暗寓于这种人事的迁转、变幻当中。

1366至1367年间，徐达等率领的讨张大军横扫江南各地。就在徐达大军行将围困吴城的1366年中秋，居处吴中的徐贲、王行、余尧臣、高启等人还曾一同前往张羽住所共同赏月赋诗，仿佛丝毫未曾闻到战争的烟火一般。徐贲有《丙午中秋与余左司王山人高记室同过张文学宅看月》诗记其事，诗中有句云：“缘知乐景不易遇，匪曰嗜好成淫耽。”<sup>[19]</sup>是明知事态紧迫的借酒浇愁，还是枉顾世事的纵情恣肆？也许从这两句中能够多少窥见诗人们载酒高歌时那潜藏于心底的“羁愁”。面对日益窘迫的局势，即便寓居吴中的诸人有归乡的打算，似乎也很难成行。于是仅过了两个多月以后，苏州城就如铁桶一般被围困。身处其中的诗人虽然身心俱困，却也常作诗意的化解。如高启所作《闻晚莺》《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》二诗，即注明写作地点是“在围城中”。其中《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》诗标明为“元夕”在城南“会饮”所作，当中有句云：“艰危壮气喜弥激，利器未施宁忍挫？颇闻原野多杀伤，风雪呻吟苦无那。吾侪斯乐岂易得，应愧皇天恩独荷。”<sup>[20]</sup>其时大军围困苏州城不久，形势虽尚未变得不可收拾，然而也已陷入愁云惨淡的境地，在“去岁属无虞”与今时“元夕共欢人几个”的两相对照之下，战争的阴云就发生在自己身边，今时的处境便显得越发艰难。相比之下，《闻晚莺》一诗写得更为含蓄婉转。诗为作者耳听“晚莺”鸣叫后感而作，时间应当在三、四月之间：“昨岁闻孤啭，绿阴山院行。今朝寝斋雨，重听独含情。西涧多乔木，何为亦到城？”<sup>[21]</sup>如果不是联系到诗人身陷围城的

遭遇，很难从中读出那种悲叹于世事风雨飘摇的感伤。与前首相似，此诗同样采取了一种“昨岁”与“今朝”进行对比的结构：与曾经惬意悠闲的“山院行”状态相比，今时处身围城中的诗人重听“孤唳”，正值春雨绵绵，联想到自己的处境，不禁愁思无限。乔木到城，则暗示了诗人有家难归的苦闷心情。

与张羽、高启等人遭遇同样处境的徐贲，在至正二十七年（1367）苏城被破之前也写过多首诗作。如所作《丁未六月廿八夜作》诗云：“西风作雨又仍休，卧起园斋夜更幽。天黑露华凉不下，云疏河影淡还流。阴虫齐响浑忘夏，落叶频飘预报秋。乱后俄惊时节异，却将何计为消忧。”<sup>[22]</sup>同年八月二十二日，其子顺哥沦逝，张羽表示安慰，徐贲作《答张来仪见慰丧子顺哥》诗云：“每忆当年梦白炊，如今又赋杏伤诗。众中独有君相念，知得君曾有此悲。”<sup>[23]</sup>从以上诸作来看，徐贲在诗中所要表达的主要仍是一己的私人情感，至于困围困城中而产生的时局感慨则被隐藏了起来。

时过境迁，十月围城最后以二十余万吴中士民被押解到南京而告终，其间因此丧命者又难计其数。高启在战事过后偶遇旧识，语中带有一种故人相见、劫后余生的沧桑感。其所作《兵后逢张孝廉醇》诗，既有友人沦逝之痛，也有意外相见之喜：

前年远别君父子，遭乱相传皆已死。今朝南陌忽逢君，为识人中语音似……间关仅得返乡里，脱命罗网真秋毫。问我胡为亦憔悴，十月孤城陷围内。艰难两地得俱全，政荷皇天怜我辈……城中故旧散欲尽，君来使我忘忧悒。<sup>[24]</sup>

无论是张氏父子避兵异乡，还是高启自己被困城中，都可谓九死一生。而像杨基、徐贲、余尧臣等人，尽管逃过身死之厄，却又遭受发配苦寒之地的悲惨下场。在此情形下，能够与曾经相交并且传闻死讯的友人重逢，对诗人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惊喜，一起回想当年共同经历的美好时光，缅怀那段令人难忘的记忆。至于在经历人生起落、悲欢离合之后的感悟，在诗人而言不过只是一种聊以自慰的心理暗示，昔日的豪情壮志早已归于消沉，归隐山林才是人生的最好选择。

事实上，在世事纷乱、朝不保夕的元末，以及

迁谪、流放、身死之厄等非正常遭遇频现的明初，以追忆、怀念、伤悼友人为题的诗歌写作在在可见。类似张羽《怀友诗》《续怀友诗》、高启《春日怀十友诗》、刘崧《十三人赞》、刘炳《百哀诗》这类群像式的作品，也便成了诗人对昔日欢愉岁月最好的纪念与怀想。高启的《春日怀十友诗》作于元末，怀念自己与杨基、张羽、余尧臣、王行、吕敏、宋克、徐贲、王彝、陈则、僧道衍等人的吴城北郭唱和岁月<sup>[25]</sup>。刘崧《十三人赞》记述了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至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）的13年间，自己熟识的13位士友先后因战乱而亡歿，意在以诗（赞）存史：“余故自至正壬辰遭乱，至甲辰十有三载，如筠阳刘枢、刘机，龙泉章善，新建郑大同，靖安舒庆远、胡斗元，高昌玉珊，西域德礼悦实，高安李朋，吉水萧彝翁，清江杨士弘，庐陵旷达，豫章万石，西昌康震，吉水刘文昌，庐陵赵睿，皆忠义文行之士。或儋爵食禄，或草野布衣，或功业未就，同罹祸毒，其悲愤赴死，与忧患无聊以没者尤相望。呜呼！千载之下，庶几或有因余言而得其为人者，其逢时不淑，不亦交可感哉！”<sup>[26]</sup>在时代动荡的纷乱面前，个体生命显得微不足道。然而对每一生命个体而言，与之交往的每个人都是鲜活的存在，却不幸在乱离的世事中遭遇死亡的命运。如此情势之下，诗人内心情感的悲痛与哀伤也就不难想见，作诗怀想也是情感的再次体验。易代之变对诗史演变的影响，也由此得到体现。

张羽在《怀友诗》跋语中向读者预告了自己将来还会有怀友续作，即所谓“约需续赋，用继末篇”，在时势变迁背景下带有“以诗存史”的意味。于是，他在入明以后又写了《续怀友诗》5首。他在诗前的序中交代自己续作的缘由说：

予在吴围城中，作《怀友诗》二十三首，其后题识者四人，则嘉陵杨君孟载、介丘王君止仲、渤海高君季迪、郟郡徐君幼文也。时予与诸君及永嘉唐卿者游，皆落魄不任事，故得留连诗酒间，若不知有风尘之警者。及兵后移家武林，向所怀廿三人往往而见，而五君者或谪或隐，各相睽异。叹离合之无常，感游从之难得，作《续怀友诗》五首。<sup>[27]</sup>

与作《怀友诗》时身处围中不同,《续怀友诗》写于张羽明初寓居杭州时期。然而对诗人来说,“怀友”的距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,甚至当初围城之中所怀的友人还可以时常相见,而入明以后所怀想的高启、杨基、徐贲、王行、余尧臣等人,却因为或遭贬谪,或归乡隐居,更加难以相聚。这样的情形,让诗人不得不感叹命运离合的无常,又无比怀念昔日吴城北郭相处的美好时光。于张羽而言,高启、徐贲、王行、杨基、余尧臣可谓是他最亲密的诗友,前四人明初时都曾为其所作《怀友诗》写过题辞。张羽《续怀友诗》的各篇诗题,一方面显示了诸人在入明后新的政治身份,同时也暗含了各人在明初后已失去作为诗人的自主性。在此背景下,战争的硝烟散去以后,各人的行迹却睽违难期。因而续作的每首怀友诗中,处处透露着诗人心中友情难续的感伤,那种“寻遗躅”“无休日”“邈难期”“向谁论”“何由及”的孤独与落寞,既体现了诗人对昔日友人欢聚时光的留恋与追忆,又反映了明初以后诗人真实的生活和心理状态。对高启、杨基等大多数江南士人来说,也是同样如此。

### 三 吴中“诗史”:入明 江南士人的情感记忆

对江南文人来说,1367年不仅是时间的分界线,也是朝代更迭的分割线。从这一年末开始,历史的车轮便迈入了朱明时代:公元1368年,朱元璋正式即皇帝位,定年号洪武。就像任何王朝易代的历史时期一样,面对这样的巨大变化,士林中为新朝欢呼雀跃者大有人在,哀悼旧朝者也不乏其人。1368年的某一天,王逢在接到儿子的信后,有感而发,写下了五律《得儿掖书时戊申岁》:

客梦躬耕陇,儿书报过家。月明山怨鹤,  
天黑道横蛇。宝气空遗水,春程不见花。衰容  
愧耆旧,犹语玉人车。<sup>[28]</sup>

诗写得颇为隐晦,卒读之下,很难看出里面有多少故国之思。然而王逢既然在入明后以遗民自居,就很难不让人去揣度其诗是“别有用意”。有人就从中读出了作者那割不断的旧朝情愫:“钱牧斋谓此诗几于悖谬,亦各行其志也。视迎降恐后者,毕竟

何如?”<sup>[29]</sup>作为前朝遗民,王逢在洪武开元时未表现出欣喜欢跃之情也在情理之中。元朝尽管是异族统治,却并不妨碍士人在王朝更替之后保持儒者气节。在传统儒家伦理观念中,眷念旧朝的“各行其志”比“迎降恐后”的贰臣,在品格方面高出不止一筹。在这一点上,并不关乎新旧统治者是否圣明或者昏庸。

对入明以后的吴中诗人来说,张士诚治下的苏州留下的多是美好记忆。高启曾作《吴趋行》乐府,称赞吴地为元末乱世中难得的安逸所在:

仆本吴乡士,请歌吴趋行。吴中实豪都,  
胜丽古所名。五湖涵巨泽,八门洞高城。飞观  
被山起,游舰沸川横。土物既繁雄,民风亦和  
平。泰伯德让在,言游文学成。长沙启伯基,  
异梦表休祲。旧阙凡几家,奕代产才英。遭时  
各建事,徇义或腾声。财赋甲南州,词华并西  
京。兹邦信多美,粗举难备称。愿君听此曲,  
此曲匪夸盈。<sup>[30]</sup>

1367年秋苏州城破,朱元璋基本完成一统南方的霸业,曾经遍燃江南各地的战火也即将熄灭。然而对曾经活跃于苏、杭一带的江南士人来说,历史的硝烟并没有就此散去,而是在他们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更何况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或者自己遭到流放,或有亲朋好友被发配至偏远、苦寒之地。若干年后,当高启重新站在张士诚宫殿旧址前,遥想当年的繁华与喧嚣,不禁感慨丛生,写下《吴城感旧》诗:

城苑秋风蔓草深,豪华都向此销沉。赵佗  
空有称尊计,刘表初无弭乱心。半夜危楼俄纵  
火,十年高坞漫藏金。废兴一梦谁能问?回首  
青山落日阴。<sup>[31]</sup>

苏州城为张士诚政权中心,高启元末时长期居住于此,虽然未曾担任实际官职,但与之交好的淮南行省参政饶介为张氏政权重要成员,杨基、徐贲等也均入其幕下。高启将张士诚比拟为秦末赵佗和三国刘表,既有为之开脱的意味,又暗含惋惜之情。而在长达10个月的围城之战中,他又曾亲眼目睹明兵从围困到攻克苏州城的整个过程。战争的残酷无情,个体生命的脆弱,在王朝更替、历史废兴面前都变得无足轻重。岁月无声,青山依旧,追忆昔日

繁华景象，留下的只是一声叹息和满目荒凉。情感上的恋旧，从一个侧面映衬了对当下处境的不满。

自从1367年徐达等人攻破苏州城后，当年曾在长洲北郭以诗酒唱和的高启、杨基、徐贲等人，虽然已不再有大规模聚处一地的条件，但少数几人之间仍时有相会，而能够将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，则是对当年交游唱和光景的追忆。高启曾作《和张羽怀吴兴旧游之作效其体》诗云：

城贯绿川长，朱阁映飞梁。莺娇山唱度，  
莲艳水嬉张。花童搦翠管，桑妇挈银筐。箬溪  
酒脂碧，顾渚茗旗香。择胜事未厌，惊乱意俄  
伤。回看旧游地，秋草变凄凉。<sup>[32]</sup>

张羽为什么会写追忆吴兴旧友的诗，又是什么原因触发高启和作的兴趣？引起他们共同感情的，是对元末友朋燕聚、唱和美好时光的留恋与怀想。诗中呈现于读者眼前的今昔对比画面，形成了从繁华到衰败转换的鲜明对照，尽管没有明言这样的变化是由元明易代所引起，然而诗歌透露出的对昔时光景的追念已触目可见。在此情境之下，不免会让人产生对彼时江南诗坛由盛入衰景象的联想。

入明以后，高启常沉湎于对元末时期北郭诗人唱和的追忆当中。他曾作《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》诗，以今昔对比凸显情感张力：“忆昨结交豪侠客，意气相倾无促戚。十年离乱如不知，日费黄金出游剧……自从飘零各江海，故旧如今几人在。荒烟落日野乌啼，寂寞青山颜亦改。须知少年乐事偏，当饮岂得言无钱。我今自算虽未老，豪健已觉难如前。去日已去不可止，来日方来犹可喜。古来达士有名言，只说人生行乐耳！”<sup>[33]</sup>高启、徐贲、杨基等人元末时聚居于长洲北郭，意气相投，由于相对安定，对世乱的局面虽有所感知，但切身体会不深。诗中对诸人在元末交游、唱酬的描写极尽铺陈，可以想见即使在时隔多年之后，诗人仍然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，诗中对当年情境的抒写即是这种情感的再次体验。而在经历易代的变局之后，昔日乐游的故旧已散落四方，存歿不知。自己虽然正当青壮年，却已深感大不如前，发生如此变化的关键不在于年龄的增长，而在于心态的日渐疲颓。事实上，在入明以后，高启曾不止一次在诗中凭吊吴城旧事。如他曾作《齐云楼》诗云：

境临烟树万家迷，势压楼台众寺低。斗柄  
正垂高栋北，山形都聚曲栏西。半空曾落佳人  
唱，千载犹传醉守题。劫火重经化平地，野鸟  
飞上女垣啼。<sup>[34]</sup>

齐云楼在苏州府治后子城上。据《明史·张士诚传》记载：“方士诚之被围也，语其妻刘曰：‘吾败且死矣，若曹何为？’刘答曰：‘君无忧，妾必不负君。’积薪齐云楼下。城破，驱群妾登楼，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，亦自缢。”<sup>[35]</sup>在此情形下，高启诗中的“劫火重经化平地，野鸟飞上女垣啼”，便有了深重悲凉的意味。

以遗民自居的王逢，曾作《梦观间元宾》诗，追念在城破之后自尽的元廷旧官观间<sup>[36]</sup>。王逢在张、朱之战进行过程中，对战局的走向颇为关注，如他曾作《寄陈昌道检校时淮藩复濠泗徐邳等州》诗<sup>[37]</sup>。因此在听闻苏州城破的消息之后，他便写下《闻吴门消息二首》，同时也对元廷的命运表示深深的担忧：“唇亡遂使诸蕃蹙，板荡将贻上国忧。”<sup>[38]</sup>后来当他行舟经过吴门，想象当年朱、张之战的诸种情形，战火虽已逐渐消散，留下的却是江南大地的满目疮痍，于是写了《舟过吴门感怀两首》：

跃马横戈东楚陲，据吴连越万熊貔。风云  
首护平淮表，日月中昏镇海旗。玉帐歌残壶尽  
缺，天门梦觉翮双垂。南州孺子为民在，愧忝  
黄琼太尉知。

强兵富境望贤豪，戴纒垂缨恨尔曹。一聚  
劫灰私属尽，三边阴雨国殇号。江光东际汤池  
阔，山势西来甲观高。形胜不殊人事改，扁舟  
谁酹月中醪。<sup>[39]</sup>

顾嗣立《元诗选初集》选录此二首诗，后有小字注释评论说：“张氏之据浙西也，原吉有功名之望焉，故首章末句如此。其《闻吴门消息》有云：‘尽拟田单收故土，不期高幹损雄才。’又云：‘三年弟傲群情懈，十月城围百战休。’尤多痛惜之意。至于称士德为孤忠，谓东吴为唇齿，是则书生之见而已矣。”<sup>[40]</sup>对江南士人来说，张氏兄弟治下江南地域相对安宁的环境，使他们在情感认同上更加偏向于张士诚政权。

事实上，对张士诚最终败亡表示惋惜之意的绝不止王逢一人。贝琼曾作《姑苏》诗云：

城溃姑苏伯业终，萧萧茂苑自秋风。青丝白马来江表，紫盖黄旗入洛中。宫殿独留残月照，绮罗应逐晓云空。如何十万貔貅士，不及吴陵一旅雄。<sup>[41]</sup>

立场不同，诗中表达的情感和见识自然也会有所差异。历史的后见之明，对当时的士人来说，未必就是正确或者理所当然的选择。在大多数江南士人眼中，张士诚治下的吴中是元末乱世中的一方清静地，也是他们得以安顿诗情的所在。

张羽在写给王行、高启的诗中，传递了自己从吴城之围中解脱出来后，人生的另一种遭遇和感慨。其所作《寄王止仲高季迪》诗云：

只恨孤城未解围，围开翻遣别相知。夕阳江上忽忽酒，细雨灯前草草诗。有梦直从花落后，无书空过雁来时。郭西古寺题名处，今日重游却共谁。<sup>[42]</sup>

在另外一首《登姑苏台怀古》诗中，张羽试图将自己的情感拉远到遥远的年代，以“怀古”之名抒写自己的悲凉之感：

荒台独上故城西，辇路凄凉草树迷。废冢已无金虎踞，坏墙时有夜乌啼。采香径断来麋鹿，响屐廊空变蒺藜。欲吊伍员何处是，淡烟斜日不堪题。<sup>[43]</sup>

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张羽以太常寺丞奉旨前往风阳祭祀皇陵，一路舟行，写下了9首纪行诗。其中第六首为经过高邮所作：

茫茫高邮城，下有古战场。当时奂盐子，弄兵此跳踉。燕师扫境出，供馈走四方。长困西百里，旌甲耀八荒。势如泰山颓，一卵安能当。骄将存姑息，顿刃待其降。两机不容发，岂暇虑杀伤。一朝谤书行，将殒兵亦亡。嗟哉三里城，百万莫与亢。鹿走命在庖，终然属其王。空余菩萨台，落日风沙黄。<sup>[44]</sup>

一位吴中旧人，却要以新朝官员身份去皇陵祭奠，经过的地方又是昔日战事发生的故地，不知张羽当时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写下这首诗。“空余”一词，或许最能体现诗人面对茫茫高邮城而发出的感慨。回想当年，多少恢弘壮阔的场景曾在此上演，然而历史风云变幻，人世沧桑，只有落日、风沙、亭台、山川依然故我。情感上的转折，不仅反映了吴

中诗人入明以后普遍挫折的命运，也是他们彼时真实心境的写照。

对入明以后的吴地（包括寓居）士人来说，元末吴城既是自己生命历程的一段回忆，又是淹没于王朝更替烟云中的历史。因而在他们这一时期所作的“忆吴”诗中，常充斥着“怀古”和“思旧”两种情绪，既包含有远距离的历史沧桑感，又时时流露出沉醉于回忆的自我哀伤。如杨基《初归吴中感事》诗云：“附郭好山远近，绕城流水西东。人哭人歌夜月，花开花落春风。”<sup>[45]</sup>山水依旧，人事却已不可言说。对诗人来说，春风吹来，花开花落，看似无情，却远远好过因为世事变化而长歌当哭的自己。而他所作的《遇史克敬询故园》诗，则更有一种今昔对比的落寞感伤之情。诗有短序云：“克敬自长洲来，因询吴中风景，大异往昔，赋此以寓乡里之思云。”诗句则充满了对往日美好时光的回忆：“三年身不到姑苏，见说城边柳半枯。纵有萧萧几株在，也应啼杀树头乌。”<sup>[46]</sup>吴中风景大异往日，诗人自己也已三年未曾前往。回忆昔日与友人北郭唱和的情形，日日流连于吴中山水之间，其间情感的起伏与变化不言而喻。一种今不如昔的感伤情绪暗寓其中，也预示了往日诗社盛事的难以重现。

战乱过后，一切都已不复昔时旧貌，物已非，人亦非。高启曾作《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》诗云：“去年看花在城郭，今年看花向村落。花开依旧自芳菲，客思居然成寂寞。乱后城南花已空，废园门锁鸟声中。翻怜此地春风在，映水穿篱发几丛。年时游伴俱何处？只有闲蜂随绕树。欲慰春愁无酒家，残香细雨空归去。”<sup>[47]</sup>从“城郭”流落到“村落”，目睹花开，思及去年旧景，眼前的一切美好景象，只能引起诗人的无限忧思，昔日高朋满座的南园旧地，花已谢，园已空，人亦不知所踪，在残香细雨中，满腹惆怅无处排遣，借酒消愁亦不可得。高启作为吴人，经历了由元入明的历史大变局，切身体会到不同时代背景下吴地民众处境的变化。其所作《送何明府之秦邮》诗云：

马前风叶助离声，楚驿都荒不计程。一令尚淹三县事，几家曾见十年兵？夕阳远树烟生戍，秋雨残荷水绕城。父老不须重叹息，君来应有故乡情。<sup>[48]</sup>

尽管情思隐晦，然而其中似乎有为吴地百姓鸣不平的意味。元末江南一带是战乱最频繁的区域，民众长期饱受战火之苦。入明以后，由于朱元璋对张士诚的仇恨，对曾为张氏政权统治地区的吴地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政策，征收高额赋税。在此背景下，民众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。地方官员充当着国家政令的施行者和代言人，诗末一句“君来应有故乡情”看似在宽解高邮百姓，实则是针对将出任地方官的何某（淮东人）以及他所代表的当政者发声，其中又有为吴地民众请命的含义。诗中有史，在高启的诗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。

相比景物的触发，与故友有关的事物、场景更能激起诗人对美好时光的回忆，以及对当下处境的感伤。高启作《闲理篋中得诸友诗存歿感怀怅然成咏》诗云：“闲理乱帙中，乃得故友篇。颜色见遗翰，琼华尚清妍。忆昨游名都，结交此群贤。日枉贻赠词，情文蔼相宣。俯仰未十周，飘零若云烟。生者应白首，死者俱黄泉。屈指俱别离，羈愁独江边。旧怀谁能识，洒涕东风前。”<sup>[49]</sup>徐贲所作《己酉八月十七日夜泛碧浪湖泊浮玉山对月呈席上诸公》诗，虽然是流连山水与友人的唱和之作，却仍然未能忘情于自己经历的“丧乱”岁月。诗云：“水月共秋妍，山椒夜泊船。人来黄叶浦，渔宿白鸥天。闻唱风澜外，持杯露影前。自从经丧乱，谁得此留连。”<sup>[50]</sup>看似沉醉于山水之中，实则始终未能与山水合一，仿佛此刻短暂的悠闲，都不过是强颜欢笑，所谓“自从经丧乱，谁得此留连”，正是诗人数年来遭遇艰难的真实写照。而当历史的镜头拉远到数年以后，杨基、徐贲、张羽、高启等人都在新朝出仕，各人的仕履出处却很少存在交集，相互间也只能通过诗、书存问致意。在此背景下，当年吴中相聚的记忆重又泛起，也就很自然地笼罩着一种怅然的情感。张羽《答山西杨宪副故旧见寄》诗云：

晋鄙遥山接太霞，十年从仕鬓空华。秋来有雁偏催客，腊尽无梅更忆家。私属羊毛皆入税，边风马乳代烹茶。番思共隐江南日，每为论诗到晚鸦。<sup>[51]</sup>

杨基入明以后曾被征赴京师，辗转出任山西宪副，后来卒于任上。张羽作《挽杨宪副孟载》诗云：

南北云山赋远游，白头终老晋阳秋。千篇留得平生稿，半似苏州半郢州。<sup>[52]</sup>

徐贲入明以后也曾应诏为官，然而却很难体会壮志满怀的豪情，萦绕于心的仍是当年吴城北郭唱和留下的美好回忆。他在《江西途中寄吴城北郭王李诸友》中写道：

雨晴沙渚片帆开，葭莩飞花雁叫哀。千里有情思北郭，半年无梦落南台。山遮故国层层出，云押长江片片来。可是宦途吟思恶，强凭尺牍浼清才。<sup>[53]</sup>

对杨基、高启、张羽、徐贲等人来说，苏州岁月是他们永难忘却的青春记忆。一群意气风发的青年诗人在吴城北郭诗酒唱和、纵论古今的壮阔场景，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生活的挫折而被淡忘，每每又会在写给友人的诗、书中跃然纸上。若是联系到各人最终不幸的下场，昔日那种“共隐江南”相互“论诗到晚鸦”的美好回忆，似乎成了对他们入明以后仕履生涯的一种无声嘲弄。诗坛的转折与消沉，便由这种人事的辗转变迁得到反映。

明初江南诗史的挫折，由“吴中”作为诗坛中心区域的瓦解发端，至高启之死而转入低谷。洪武七年（1374），高启受魏观“重修苏州府第案”牵连而被诛，在江南文人内心造成巨大震动。杨基、王行、徐贲、方彝、张羽等生前知交故友纷纷写诗、文悼念，抒发哀思。诸作当中，杨基的《哭高季迪旧知》最值得玩味：

鸚鵡才高竟殒身，思君别我愈伤神。每怜四海无知己，顿觉中年少故人。祀托友生香稻糗，魂归丘陇杜鹃春。文章穹壤成何用？哽咽东风泪满巾。<sup>[54]</sup>

杨基称赞高启“才高”却喻之以鸚鵡，其意甚不可解，似乎是说高启作上梁文、上梁诗只是应景之作，却因为才情横溢、内蕴丰富而被附会另有深意，因此得罪而被处以极刑。处于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中，杨基诗中的含义十分隐晦，上述的解读也终不过只是猜测之词。尽管如此，对曾经生活在张士诚统治地区的江南诗人来说，高启的遭遇仿佛一把高悬于他们头顶的利剑，不期然会在某个时刻倏而坠落。杨基、徐贲、张羽等人最终的遭遇，为这样的忧虑做了最好的注脚，三人最后都以非正常的方式

走向了人生终点：张羽坐事流放岭南，半道召还，投江而死；杨基被谗夺官，罚服劳役，卒于工所；徐贲以军队过境，犒劳失时下狱，并被安置了一个“犒师不周”的罪名而遭处死。高启作为元末明初诗坛标志性的人物，“吴中四杰”之首，他的非正常死亡，宣告了元末以来所谓“一变元风，首开大雅”诗学思潮的结束。正如张羽在悼诗中所说，“君亡谁复可言诗”<sup>[55]</sup>，不只是对唱和诗友而言的知音难觅，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。

[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“《钟惺全集》整理与研究”（18AZW015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]

- [1] 谢应芳：《祭顾仲英》，《明别集丛刊（第一辑）》第一册，沈乃文主编，第325页，黄山书社2013年版。
- [2][13] 钱谦益：《国初群雄事略》，张德信、韩志远点校，第145页，第204页，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卢熊《苏州府志》以为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在至正十七年，此前所改名称为隆平郡。
- [3][14] 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，卞永誉纂辑，第878页，第2035—2037页，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。
- [4] 陈基：《夷白斋稿》，《四部丛刊三编》第462册，张元济辑，页三b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。
- [5] 都穆：《南濠诗话》，《全明诗话》第1册，周维德集校，第517—518页，齐鲁书社2005年版。
- [6][7][8] 张昱：《可闲老人集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22册，第567页，第565页，第566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- [9] 《吴王张士诚载记》，支伟成、任志远辑录，韩国钧审定，杨镰、张颐青整理，第65页，中华书局2013年版。
- [10] 《明诗综》，朱彝尊选编，第668页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。
- [11] 朱彝尊：《静志居诗话》，姚祖恩编，黄君坦校点，第122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。
- [12] 汪广洋：《凤池吟稿》卷七，页一b，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）王百祥刻本。诗题下注云：“丙午（1366）秋，大军围苏州，余奉命计议军务，感而赋此。”
- [15] 李日华：《六研斋三笔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67册，第668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- [16] 张丑：《真迹目录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817册，第533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- [17][19][22][23][50][53] 徐贲：《北郭集》，卷九页六a、页六b，卷四页二a，卷七页三a，卷九页六b、页七a，卷六页二a，卷七页十二a，明成化二十三年（1487）张习刻本。
- [18] 王行：《半轩集》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第1231册，第389页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。
- [20][21][24][25][30][31][32][33][34][47][48][49] 高启：《高青丘集》，金檀辑注，徐澄宇、沈北宗校点，第342—343页，第251页，第344页，第133—138页，第5—6页，第597—598页，第248页，第335—336页，第628页，第344页，第593页，第22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。
- [26] 刘崧：《槎翁文集》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集部二四》，第396页，齐鲁书社1997年版。
- [27][42][43][44][51][52][55] 张羽《张羽集》，汤志波点校，第63—64页，第181页，第325页，第56页，第326页，第342页，第209页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。
- [28][36][37][38][39] 王逢：《梧溪集》，李军点校，第355页，第387页，第306页，第327页，第329页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。
- [29] 此为明景泰重修本诗后跋语（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95册，第516页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），应为后人所加，而非原刊本所有。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（第1218册）“钱牧斋”作“李东阳”（第733页）。
- [35] 《张士诚传》，张廷玉等：《明史》，第3696页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。
- [40] 《元诗选初集》，顾嗣立编，第2240页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。
- [41] 贝琼：《清江贝先生诗集》，《明别集丛刊（第一辑）》第九册，沈乃文主编，第189页，黄山书社2013年版。
- [45][46][54] 杨基：《眉庵集》，卷十页十一a，卷十一页十二b，卷九页二b，明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张习刻本。

[作者单位：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]

责任编辑：马勤勤